



逃犯条例 深度

评论

郑炜、钟晓烽：从零零后到银发族，反修例运动的不同世代想要什么？

假如一直这样下去，当权者放弃的是几代人？

2019-09-12



2019年8月3日，旺角再游行后，示威者在尖沙咀被警察驱散后途经一间酒吧。摄：林振东/端传媒

悠长暑假告终，政府撤回条例，但历时三个月的“逆权运动”，却未休止。这边厢，大中学生以罢课、集会、筑人炼、流水式占领和海外文宣等手法，持续抗争，警民冲突也变得常态化。那边厢，以中老年人为主干的反向动员，以撑警集会、监察罢课巡视组或向政府部门投诉等方式反击。前者批评“废老”缺乏独立思考，不懂得自由的珍贵；后者喝骂“废青”不思长进，破坏秩序。

除却意识形态之争，这场运动无疑有一定程度的世代鸿沟。但是，在一场持续动员的全民运动里，年龄或世代的分歧是否那么明显？不同世代的示威者，在政治诉求、社运激进化、冲击行动和政治参与的取态是否类同？持续的示威，有没有产生某些共同经历，糅合不同背景的参与者？整场运动又如何影响他们日后的行动意欲？过去三个月，我们联同中大李立峰、岭大袁玮熙和恒大邓键一等学者，一直追踪这场运动。这些跨时序的现场数据，有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单从参与的年龄组别的参与率来看，“生命周期”（life-cycle）的逻辑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表一，列举了八月份我们曾进行调查的大型集会和社区游行，并按参与人数的年龄层分布。历次示威的主体，都是年青人，30岁以下的参与者占整体的六成多。当抗争的形式或主题较为激进的时候，如8月13日机场的不合作运动或8月16日的遮打花园“学界x揽炒”集会，七十后的中老年人的参与比例下降到不足一成。但到了8月底以“和理非”为主调的集会，中老年人的参与率又回复到约两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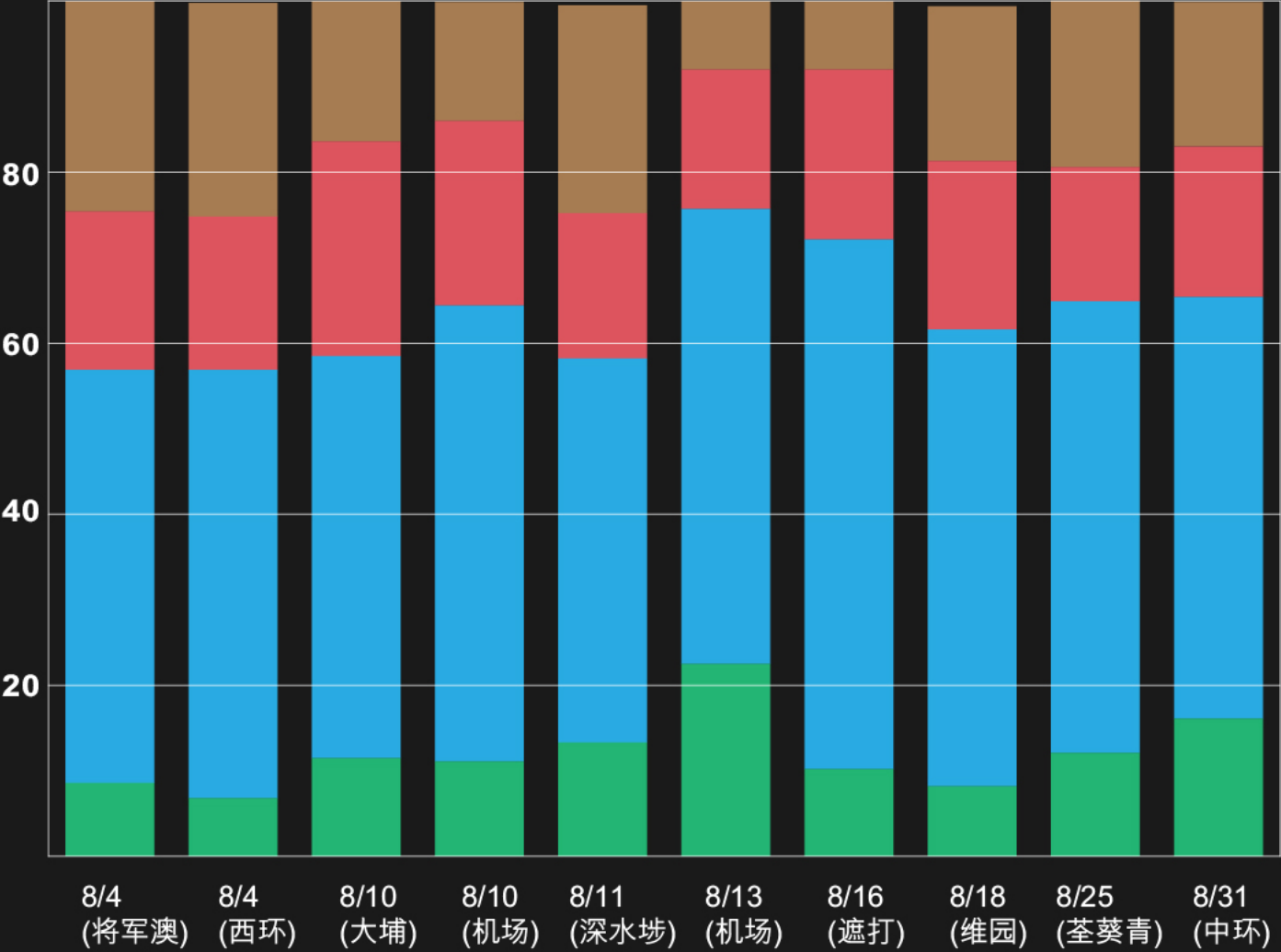
以生命周期来分析政治行为的理论，认为不同年龄层有著不同的生理需求和社会心理特征。年青人开始确立价值观和认知能力，普遍有较多空余时间和热情，故倾向参与社会运动。人到中年，多了生活的牵绊、家庭的责任和利益的计算，便会日趋保守。

参与示威人士年龄组别的百分比



OO后 (19岁或以下) 八O后 (30至39岁)
九O后 (20至29岁) 其他 (40岁或以上)

100 (%)



图：端传媒设计组

（表一的样本量分别为：717、554、366、1905、412、485、627、801、395、527人）

可是，生理周期的说法其实很粗疏。自十年前“八十后”成为香港抗争青年的代名词后，坊间盛行一种以出生年份划分社群的世代论述。当然，这种世代论述同样宏观，难以深入解释社会现象的底因。但无可否认，这种论述可能是不少政府官员和市民，用作说明以至解释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框架。那么，借用这种世代划分切入，依然有助我们拿捏这场运动的细节。正如表一显示，示威群体主要集中在九十后（20至29岁），占整体一半。属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主要是大学生及初入职场的人。而不再“年青”的八十后以及更年长的人士，其实也绝不在少数。

关于世代，社会科学界有一套理解政治行为的理论框架，称为“世代效应”（**generational effect**），回应生命周期说法。世代效应指出，政治行为形式主要是由同代人的年轻时期的社教化过程，譬如教育和社会流动所塑造。按此思路，近日杨凡导演的得奖感言，就颇具代表性。对于这群逃避新中国成立移民南来的“五十后”，他们的个人发展固然得益于边城的自由，但他们对社会失序的恐慌，时移世逆五十载，依然根深柢固。所以他们可以一边批判左派，又一边指责今天的自由派。因为“六七暴动”和“逆权运动”即使千差万别，对这群人而言都是动荡。然而，世代效应却未能充份说明，为何香港年长者，甚至是银发素人，会持续参与这场社运。

这里“时期效果”（**period effect**）的框架，则尝试修正世代效应。研究时期效果的学者指出，某一时期所发生的历史或环境巨变，不单止对年青人有影响，对不同年龄层的群体，都有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经历了民权运动和越战的几代美国人。透过参与社会运动的共同经历，他们渴求个体自由，追逐公平社会，骨子里也传承了集体的公民意识，不断守护他们的民主制度。

以下我们会分析8月10日香港机场“万人接机”集会的调查数据，试图探讨这场“逆权运动”会否存有世代差异和时期效果。必须指出，现场调查只可以勾勒一些相关的初步观察，若要揭示时期效果的运作机制，我们还需要透过其他质性研究方法，进入不同世代参与者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由于问卷设计会依据事态发展而调整，我们在8月中开始的调查并没有同时追问受访者的游行或集会目的、社运激进化的态度，以及受访者日后的行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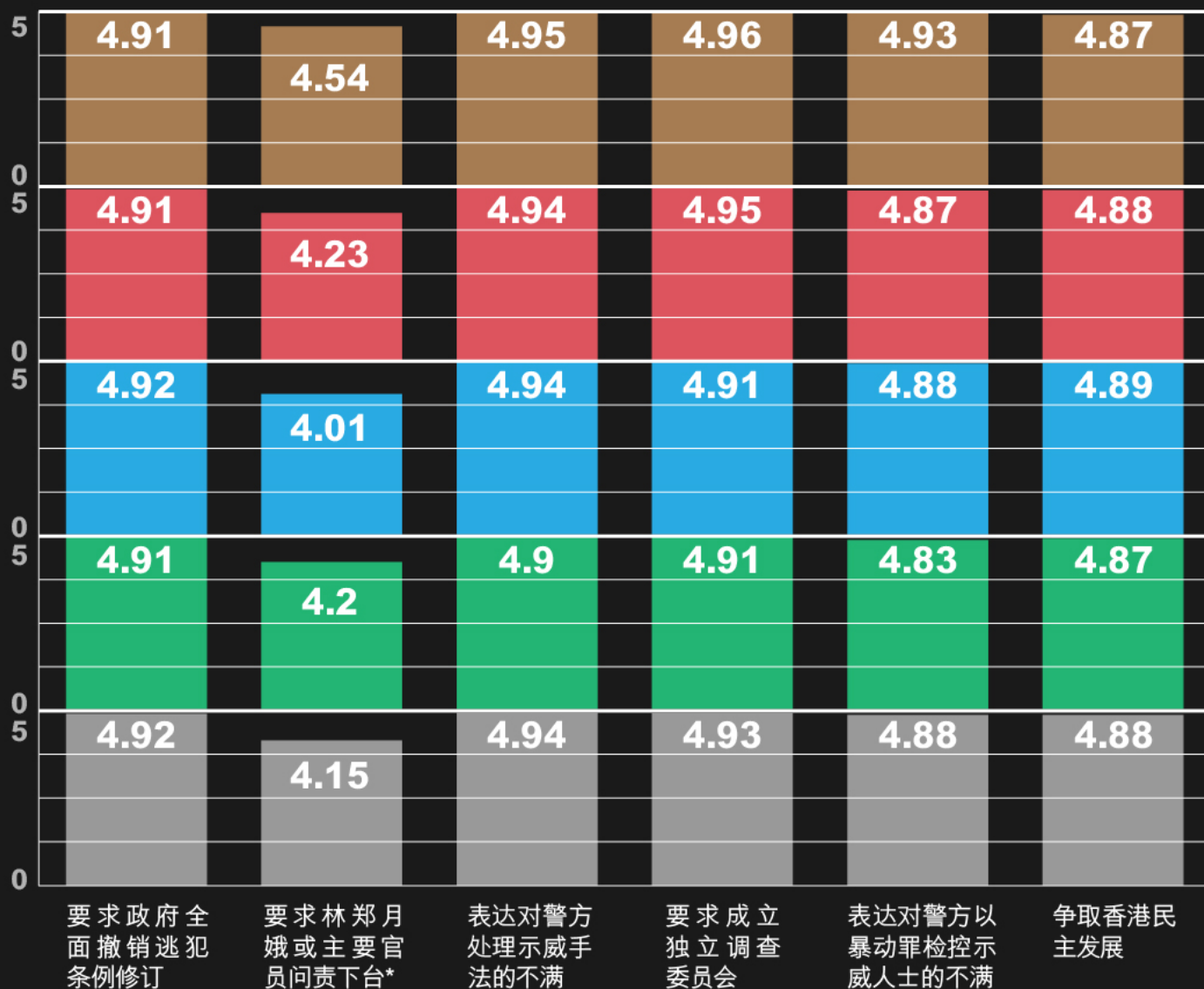
欲。在这组题目上，8月10日的调查数据较为完整，同时样本数量较多，适合作多个组别的比较分析。

第一步，我们测试了示威者的游行诉求和年龄组别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表达对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和“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示威者参与运动的最重要原因，略高于“全面撤销逃犯条例修订”。值得注意，虽然要求特首或主要官员问责下台明显不是他们的主要诉求，但不同年龄的示威者只在这个选项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对于年长的示威者，也许政府官员问责下台多多少少能回应他们的部分诉求。可是，当这场跨世代的社会运动高举“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旗帜，同时关注警权问题成为示威者持续参与的主因（参见注一），特区政府始终没有对准问题核心。

示威者的游行诉求（8月10日）



■ 00后（19岁或以下） ■ 八0后（30至39岁） ■ 整体
■ 九0后（20至29岁） ■ 其他（40岁或以上）



*代表年龄组别之间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以上数字为平均值，有五个选项供受访者选择，由「1=完全唔重要」到「5=完全重要」。

图：端传媒设计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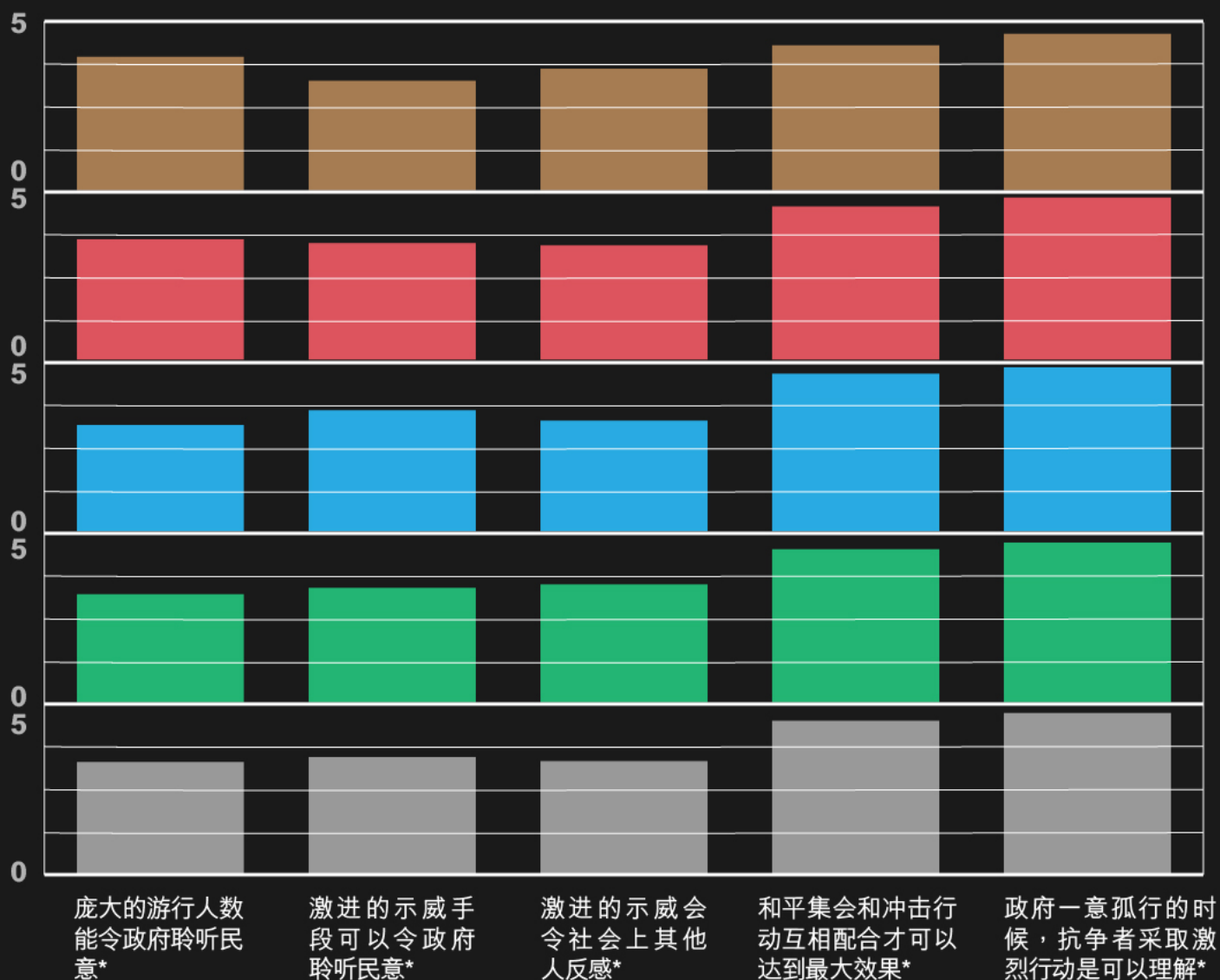
（表二至表四的样本量分别为：1898、212、1016、412、258人）

至于在激进化的态度上，最年长的组别相比起其他三个较年青组别，倾向不接受激进的手段可以逼使政府聆听民意，也较不认同“和平集会和冲击行动互相配合才可以达到最大效果”（表三）。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反而有趣的是两组年青人之间的态度分野。相比起九十后，零零后的受访者其实相对温和，比前者更倾向认为激进的手段会令社会上其他人反感，某些取态甚至比“八十后”保守。如果单从学校和家庭社教化的角度来看，八十后、九十后和零零后的生活经验其实相当接近。出现这种态度分野，其中一个合理的猜想是，零零后大多没有经历雨伞运动的内部分裂和失败记忆。相反地，不少八、九十后示威者经历社运创伤，甚至回忆起自身的伞运经验，因而更倾向要不计代价，抱著“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

示威者对激进化的看法（8月10日）



00后（19岁或以下） 八0后（30至39岁） 整体
九0后（20至29岁） 其他（40岁或以上）



*代表年龄组别之间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以上数字为平均值，有五个选项供受访者选择，由「1=好反对」到「5=好赞成」。

图：端传媒设计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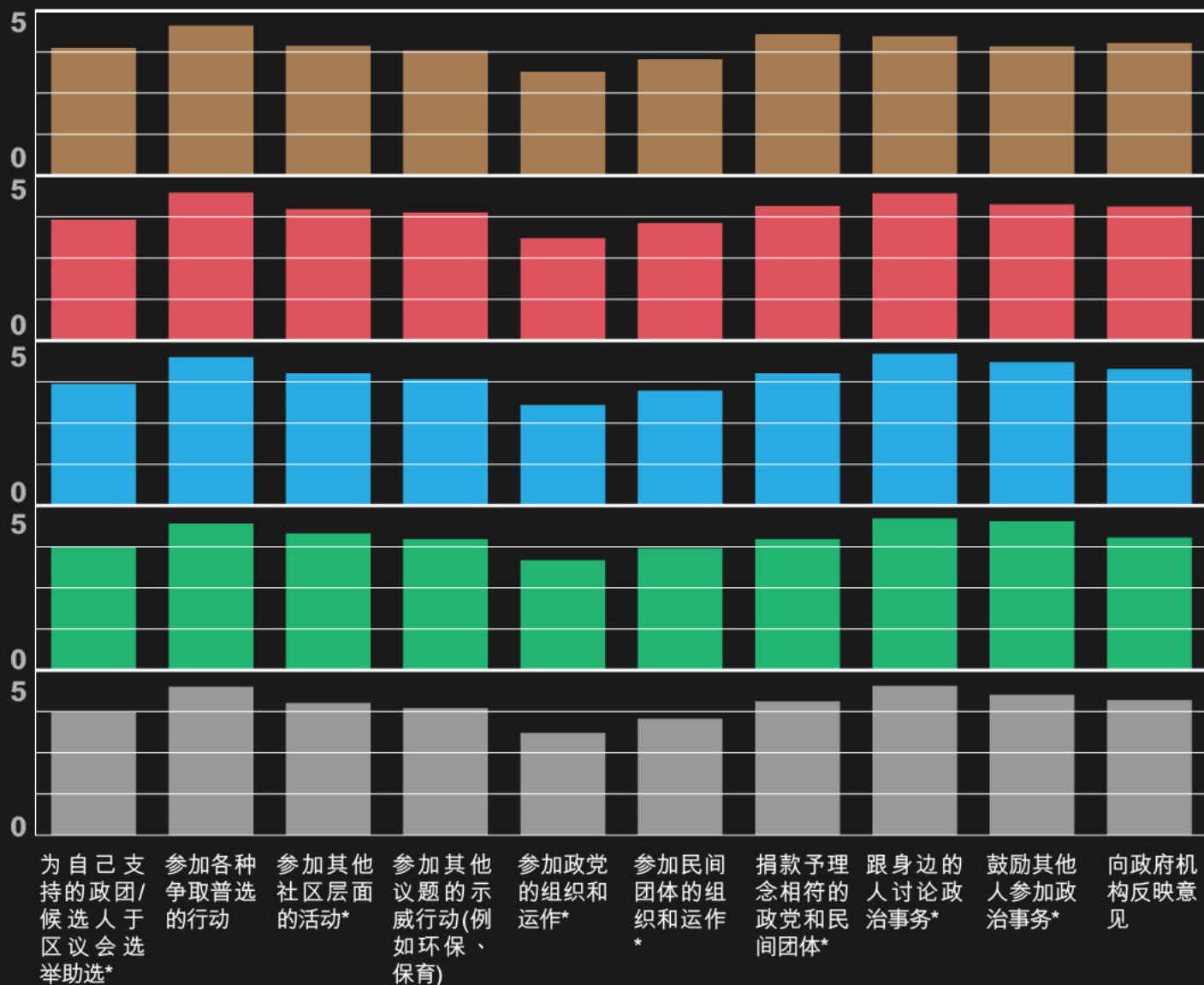
“逆权运动”相信难在短时间来告终，此刻论成败绝对言之过早。作为社运研究者，我们更关心的是过去三个月的社运经验，会怎样影响参与者的后续政治参与。所以自今年七一游行的调查，我们加入了一系列有关行动意欲的问题，涵盖选举、示威、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日常公共讨论等。

表四数据显示，不同世代的示威者都认为，这场运动整体上增加了自己日后的行动意向，当中“参加各种争取普选的行动”、“跟身边的人讨论政治事务”和“鼓励其他人参加政治事务”是最受欢迎的选项。尤其在争取普选的意向上，不同年龄组之间并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可以这样说，争取普选是不同世代参与者之间最强烈的共同行动意欲。当参与或旁观抗争成为香港人的日常，日常社交难免会提及政治。积极的政治讨论和人际间的微动员（micro-mobilization），会怎样形塑香港的公共文化和政治生态，有待进一步考察。区议会选举在即，虽然有一定受访者表示愿意助选，可是较少人愿意参与民间团体和政党，而选择参与后政党的平均值，更是所有行动意欲中最低。身处“无大台”的抗争年代，这种倾向其实不难明白。对于支持社区、环保和保育议题等，以至投身组织方面，零零后的示威者比其他年龄组别较愿意行动。可以想像，不论这场“逆权运动”最终能否回应五大诉求，年青一代的示威者都准备参与建设香港的公民社会，相信会形成不容忽视的民间力量。

示威者日后的行动或运动意欲（8月10日）



■ 00后（19岁或以下）
 ■ 八0后（30至39岁）
 ■ 整体
 ■ 九0后（20至29岁）
 ■ 其他（40岁或以上）



*代表年龄组别之间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以上数字为平均值，有五个选项供受访者选择，由「1=完全不能够」到「5=非常能够」

图：端传媒设计组

随著时间流逝，政府也许能够有效约束激进示威者，但如果这场运动塑造了的集体经历和身份，不见得会轻易磨灭。社会运动也许会因为经济环境和政治打压而转变形式，就算往后真的出现了短暂的民意逆转，却不代表得当权者赢得民心。事实上，雨伞运动以来，政府已经错过太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机会，如果仍然盲目相信整场社会抗争是纯粹的青年燥动，忽略那些很有可能“有建树”的中老年示威者，当权者所放弃的将会不只是一代香港人。

（郑炜，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钟晓烽，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高级助理研究员）

注一：李立峰、邓键一、袁玮熙、郑炜，《“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现场调查报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2019年8月。

评论

钟晓烽

郑炜

逃犯条例



热门头条

1. 抢滩越南，大陆商人被台商抛在身后
2. 早报：路透社公布林郑闭门会议录音，林郑称自己无法辞职，中央不会出军
3. 刘锐绍：林郑的“撤回”与辞职传闻都只是缓兵之计
4. 831晚太子站内发生了什么？还原警察无差别追打乘客事件
5. 早报：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敢于斗争、长期斗争
6. 萧仁豪：反修例运动中，卧底策略的三大得失
7. 老年人公园相亲角：性、户口、房子与无处安放的爱情
8. 9.8美领馆请愿：集会提早结束，示威者破坏多个港铁站，4站关闭，多区警民对峙延至午...
9. “人民币台币港币都想赚”，当台湾奶茶遇到政治表态
10. 猪哪儿去了？非洲猪瘟一年后

编辑推荐

1. 香港人是中华民国的什么人？港人赴台寻求“政治庇护”的两种模式
2. 叶静伦：香港街头的“阵地社工”，如何突破“社工只是做爱心”的刻板想像？
3. 第76届威尼斯影展探讨：“小丑”夺狮，影展的功能被消解了吗？
4. 伤感的点唱机 – 再看Robert Frank镜头下的另类美国图腾
5. 古巴粤伶百年浮生录
6. 美呔烤鸡串：矿业小镇上，串不尽的过往岁月
7. 专访刘细良：中港是命运共同体，是我们那一代最错误的信念
8. 丘伟荣：宗教遭遇民主化，希盟时代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的博弈

9. 香港困局——北京的一场宪制危机

10. 外援介入才可自救？他们为何争取《香港人权民主法》

延伸阅读

邓键一、袁玮熙：参与一场不怀期望的社会运动，人们心里在想什么？

数据说话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逃犯条例修订触怒了大批平时不太理会政治、讨厌政客、以“搵食”为先、求安定繁荣，但其实又绝不是完全没有底线和没有常识的香港人。

李立峰：反修例运动，政府支持者心中，警察会永远伟大吗？

在721元朗袭击之前，政府的民意支持有甚么价值基础？元朗袭击在甚么意义上摧毁了这些价值基础？